

明人对韩宋政权的历史书写

周中梁

【提要】 明朝初年隐讳朱元璋曾向韩宋政权称臣之事,努力压抑相关社会记忆,并在官修史籍中贬抑韩宋的地位。成化朝《续资治通鉴纲目》为贬低元朝正统地位,提高了书写韩宋政权的规格。随着龙凤文献的复出,中晚明私家史学开始关注韩宋政权,对朱元璋是否奉龙凤正朔、受韩宋官爵的观点不一。当时史家开始对韩宋进行再评价,多肯定韩宋对抗元廷的功绩,但以称赞朱元璋忠心、否定韩林儿君主身份等办法维护朱元璋的形象。钱谦益则将韩宋奉为元明之际的正统,否认明廷曾忌言韩宋。韩宋的历史地位受到官方操纵、皇权松弛、蒙汉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体现了中国古代正统观的复杂性。由此,农民战争与历史书写的关系,可作为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新视角。

【关键词】 朱元璋 韩宋政权 历史书写 农民战争

元朝末年,刘福通等人领导的农民军拥戴韩林儿以宋徽宗后裔的名义称帝,国号大宋,建元龙凤,在北方活动十余年,此政权亦被称为“韩宋政权”。明太祖朱元璋自1355年起,向韩宋政权称臣,奉龙凤年号,接受其官爵,^①但明朝开国后,刻意隐瞒了这段历史,这已成为学界共识。^②明中期以后,有关如何看待韩宋历史的争论开始出现。^③20世纪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兴起,农民战争史研究成为热点,明廷压制韩宋记忆被赋予了新的历史意义,即朱元璋由农民起义领袖蜕变为封建帝王、背叛农民革命的表现之一。吴晗提出“这一段历史被湮灭,被歪曲了几百年,成为最有启发性的历史公案。”^④但农民战争史研究者聚焦于农民战争本身的史实,看待旧史家对农民战争的书写时往往认为“农民战争大多被贬斥,农民起义者被称之为‘盗’,或‘贼’,几乎是一派骂倒声”,^⑤仅视之为史料来源,并不重视其内在逻辑。事实上,韩宋政权在明中后期至清前期已获得了一些正面评价,如明遗民顾景星诗云“梁城(指韩林儿)非盗贼,旧史可重论。”^⑥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推

① 对朱元璋历任官爵的详细考察,参见李新峰《朱元璋任职考》,朱鸿林编《明太祖的治国理念及其实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1—167页。

② 专论明廷与龙凤政权关系的研究,主要有如下成果。陈权清《论朱元璋与大宋龙凤政权的关系》,《湖南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韩立祥《吴朱元璋政权之官爵非“皆受之于宋”考》,《安徽史学》1988年第1期;Hok-lam Chan(陈学霖)“The ‘Song’ Dynasty Legacy: Symbolism and Legitimation from Han Liner to Zhu Yuanzhang of the Ming Dynasty”,《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 68, No. 1 2008;夏玉润《朱元璋与龙凤政权的奥秘(四)》,《紫禁城》2009年第12期;杨讷《朱元璋与刘福通、韩林儿》,杨讷《元史论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第176—184页;杨永康《朱元璋的元明易代观及其天命论》,《南开学报》2015年第5期;姜复宁、周琦玥《钱大昕〈潜研堂集〉再探一则——兼论明代的“龙凤正朔”问题》,《社会科学论坛》2020年第5期。其他有所涉及者尚多,此处不一一列举。

③ 除本文介绍的明人观点,清人的讨论集中见于刘承干编《明史例案》各篇目。参见刘承干编《明史例案》,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④ 吴晗《朱元璋传(1948年本)》,吴晗著,常君实编《吴晗全集》第5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4页。

⑤ 苏双碧《中国农民战争史》,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1949—1989)》,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73—391页。

⑥ 顾景星《白茅堂集》卷20《临颖旅夜与儿昌说史寄叶四掌院》,《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37页。

而广之,农民战争建立的政权,是否也可能得到旧史家一定程度的肯定?相关影响因素有哪些?本文在前人对元末农民战争及明代史学研究的基础上,考察明代官私史书对韩宋政权的书写情况,试图通过个案研究丰富对以上问题的认识。

一、明前期史学对韩宋的忌讳与贬斥

出于多种原因,明前期朝廷努力消除朱元璋曾向韩宋称臣的痕迹,并贬称韩宋为“妖人”。杨永康指出,明廷为获得士人的合作,强调自身并非直接夺取元朝政权,^①正如朱元璋语“朕取天下于群英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②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还强调自身与元帝没有狭义的君臣关系。洪武七年(1374年)《皇明宝训》载其语“自秦、魏至于六朝皆以臣篡君,惟汉高祖由布衣为天子,朕亦起于农民,遭元朝起运当终,妖人倡乱于汝颖,朕集众渡江,图保性命而已……朕本元之庶民,初无取天下之意。”^③朱元璋认为自己和刘邦均非“以臣篡君”者,明显是自居在野之“民”而非入仕之“臣”。若承认与韩宋的君臣关系,显然会破坏朱元璋“民”的身份。此外,韩宋军队对北方士人的直接打击,也是明廷与其切割的一个原因。明廷的这一态度对明代韩宋相关的历史书写、文献保存和记忆流传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廷先后从宗教信仰与起兵两方面拉开与韩宋的距离。从1366年起,朱元璋便称白莲教等宗教的宣传为“妖言”、农民军为“妖人”,称帝后更禁止白莲社、弥勒佛等秘密宗教,切断其与宗教上的联系。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称“若前日杜遵道、刘福通、韩山童、徐真一之徒,皆首乱者也。今此数人果安在哉?盖首乱殃民,荼毒太甚,故不能享富贵以善终耳。”^④朱元璋将刘福通等人定性为“首乱者”,自己只是“误入其中”,^⑤将元末战乱的责任归于率先起兵者,洗清自己的责任。

明开国后,涉及开国前史事的一些文章被改写,删去了朱元璋受封的韩宋政权官爵。初编于建文三年(1401年)的宋濂文章选集《宋学士续文粹》中,《平江汉颂》是为纪念1363年鄱阳湖之役而作。其中未叙及朱元璋次年攻灭陈汉之事,所以《平江汉颂》应作于战事同年,但文中已出现“天命皇帝为亿兆生民主……初以一旅之师兴濠、泗间”的措辞。^⑥《浙东行省右丞李公武功记》是宋濂为李文忠纪念其乙巳年(1365年)击退张士诚而作,李文忠于丙午年(1366年)十二月改任浙江行省平章,此文必作于此前,但文中出现“惟我皇帝既定浙东、西地”字样。^⑦“皇帝”的原文应分别是吴国公和吴王之类的名号,但明开国后这些朱元璋的旧称号都被改为“皇帝”。

目前虽未见明廷禁用龙凤正朔的诏令原文,但有关朱元璋用韩宋国号、纪年的痕迹在明初确实

① 杨永康《朱元璋的元明易代观及其天命论》,《南开学报》2015年第5期。

② 《明太祖实录》卷53,洪武三年六月丁丑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1046页。

③ 詹同等《皇明宝训》卷3《礼前代》,《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8册,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

④ 《明太祖实录》卷75,洪武五年七月辛未条,第1387页。

⑤ 《明太祖实录》卷37,洪武元年十二月壬辰条,第750页。

⑥ 宋濂《宋学士续文粹》卷1《平江汉颂》,转引自陈昌云、张丽平《台湾藏孤本〈宋学士续文粹〉考述》,《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6年第4期。

⑦ 宋濂《宋学士续文粹》卷1《浙东行省右丞李公武功记》,转引自陈昌云、张丽平《台湾藏孤本〈宋学士续文粹〉考述》,《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6年第4期。

成为禁忌,^①这当是明廷通过一系列具体举动逐渐释放信号的结果。夏玉润注意到,镇江地方为朱元璋颂功的石碑因带有龙凤年号而被毁;朱元璋亲撰的《朱氏世德碑》因载有韩林儿圣旨,也不见于《明太祖实录》及各版本《御制文集》。^②1358年朱元璋在婺州浙东分省官署门外树立的联语,明初老兵俞本的《纪事录》作“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明大宋天”,而刘辰《国初事迹》下联作“日月重开大统天”,这“可能是出于对元季史事的忌讳”,^③即回避韩宋国号。韩宋本有“重开大宋之天”的口号,“大统天”之语则并不通顺。朱元璋行用龙凤年号到1366年为止,但在明建国后每年颁发的官方日历《大统历》中,1364年(龙凤十年甲辰)以前仅以干支纪年,1364年朱元璋称吴王,是年至1366年记为“甲辰一年”“甲辰二年”和“甲辰三年”,不用龙凤年号。^④就笔者所见,明开国前写成的文字极少以“甲辰”纪年,此纪年法多见于明人追述开国前史事。仅江西人刘夏《刘尚宾文集》中有数篇文章写于明开国前,使用了“甲辰二年”“甲辰三年”等纪年。^⑤此集编纂于永乐年间,而成化年间编纂刊刻的《刘尚宾文续集》则使用了“龙凤十一年”“龙凤十二年”字样。^⑥度其情理,应是永乐年间《刘尚宾文集》的编刊者因政治忌讳而追改龙凤年号为甲辰纪年,而成化时禁网已宽,《刘尚宾文续集》保留了原文。

李文凤(1532年进士)认为韩宋“建国十有余年,其间所以能自立,要必有可纪者,惜载籍泯泯,莫究万一。得则为王,失则为虏。悲夫!”^⑦钱谦益亦云“日月出而燭火熄,于是龙凤之君臣事业,风销烟灭,杳然荡为穷尘,而沦为灰劫矣。”^⑧这种“载籍泯泯”“风销烟灭”的局面,既和韩宋政权与元明之际士人关系较为疏远、留下的一手记载较少有关,也是明廷政治忌讳的后果。^⑨

明初官修史学虽保存了部分韩宋史事,但并不重视的态度加速了韩宋相关记忆的散失。^⑩明前期官方史著涉及元末时段者有《元史》《明本纪》和《明太祖实录》三部,其中最应记载韩宋史事的《元史》无韩林儿、刘福通等人的专传,相关事迹分散记于《顺帝纪》及察罕帖木儿、答失八都鲁、李罗帖木儿等人列传中。明军中韩宋旧部甚多,如颍国公傅友德曾为韩宋将领李喜喜旧部、御史大夫丁玉曾仕韩林儿为监察御史、都督佥事马鉴为韩宋将领盛文郁养子等。但从《元史》对韩宋史事的记载十分粗略、且缺乏其政权内部信息来看,明廷并未设法向这些韩宋旧部采录韩宋事迹。

朱元璋早年与韩宋政权的关系被逐渐改写。朱元璋晚年仍称呼刘福通为“刘太保”,透露出其与韩宋政权的交往痕迹,但明初官修史学对韩宋政权的态度则冷淡得多。《明本纪》与《明太祖实录》书写明开国前史时均不用龙凤年号,前者用元朝至正年号,后者只用干支纪年。成书较早的《明本

① 杨讷根据《江阴卫指挥使吴公勋德碑》,认为朱元璋忌称龙凤应在洪武元年以后。杨讷《朱元璋与刘福通、韩林儿》,杨讷《元史论集》。

② 夏玉润《朱元璋与龙凤政权的奥秘(四)》,《紫禁城》2009年第12期。

③ 张佳《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改革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0页。

④ 汪小虎《明代颁历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上海交通大学,2011年,第20页。

⑤ 刘夏《刘尚宾文集》卷4《送舒仲安任满还乡序》《逸清堂诗集序》《送李湖官序》、卷5《焦氏庐墓记》,《续修四库全书》第132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89—91、95—96页。

⑥ 刘夏《刘尚宾文续集》卷2《送江西省宣使王伯源使袁州序》《送提刑按察使王伯昭之任浙东道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326册,第120、122页。

⑦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1《宋小明王》,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1页。

⑧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序”,第1页。

⑨ 应当指出,明初成书的刘辰《国初事迹》、叶子奇《草木子》等书仍保存了朱元璋政权使用龙凤正朔的痕迹。不过这些书籍的刊刻时间相对较晚,《草木子》初刊于正德十一年,《国初事迹》最早刊本见于嘉靖年间袁褫编《金声玉振集》,在明代前期流行并不广泛。

⑩ 郭玉刚亦指出《元史》的纂修立场是导致北方红巾军史料匮乏的原因之一。参见郭玉刚《北方红巾军的失败与元末“中兴之局”的出现》,《晋学研究》第1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

纪》中还保留了一些痕迹,^①其中记载1355年杜遵道、刘福通立韩林儿为帝,授予郭天叙、张天佑、朱元璋等人官职,并称“韩林儿,造言宋之苗裔也。”^②永乐朝修成的《明太祖实录》对韩宋政权史事删削更多,记载韩林儿称帝时不提大宋国号及宋室后裔名头,所载朱元璋“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一语,^③表明朱元璋不接受韩宋的左副元帅官职,由此奠定了朱元璋未奉龙凤正朔、接受韩宋官职的明代官修史主流说法。王崇武指出这“明系后来史臣增饰之笔”。^④实如钱谦益所说“渡江以后开帅府,丙申为吴国公,以逮于称吴王,凡有拜除,皆出龙凤之命,或如藩镇承制故事。国史多忌讳,皆没而不书。”^⑤《刘基行状》也有刘基指斥小明王为“牧竖”,不拜其御座一事。^⑥此行状是《明太祖实录》中刘基小传的主要史源,^⑦但小传却将此事完全删去。《国初事迹》记载1363年刘基劝谏朱元璋不应前往援救韩林儿,称“假使救出来,当发付何处?”^⑧此书于永乐年间进呈,但今本《明太祖实录》不载此事。

明代前期的私修史学受官修史学的影响,也选择了同样的基调。张九韶的《元史节要》、永乐朝楚府长史胡粹中的《元史续编》,以及刘剡撰、张光启订正的《资治通鉴节要续编》,均完全沿用《元史》的口径,称刘福通为“妖人”。

二、《续资治通鉴纲目》对韩宋的“书法”

土木之变后,北方蒙古势力给明朝带来了严重的边境危机,明朝内部“华夷之辨”的思想抬头。成化年间,明廷编纂了《续资治通鉴纲目》(下文简称为《续纲目》),为贬低元朝的地位,以纲目体特有的“书法”,提高了韩宋政权的书写规格。

《续纲目》的正文部分对韩宋不用“妖人”“贼”之类詈语,记述其起兵时云“颍州刘福通、萧县李二、罗田徐寿辉等兵起。”^⑨叙述韩林儿称帝时云“刘福通以韩林儿称宋帝。”^⑩并在大字书写的元朝年号至正十五年下,分书(以双行小字书写)“宋主韩林儿龙凤元年”。^⑪《续纲目》系统编《资治通鉴纲目》(下文简称为《纲目》),号称“提纲分目,悉遵朱子凡例”。^⑫以下参照《纲目》索解其“书法”。

“兵起”二字,《纲目》凡例解释为“其起虽不义,而所与敌者又不得以盗贼名之,则曰兵起。”^⑬以

① 王崇武认为《明本纪》与《明太祖实录》纪事相似,《明本纪》俗俚繁冗,而《明太祖实录》简练修洁,应是《明太祖实录》因袭《明本纪》,并怀疑此书为永乐初年编撰的官书。佚名撰,王崇武校注《明本纪校注》,中华书局2017年版,“序”,第2—10页。笔者推测《明本纪》纪事终于洪武五年,此书或于洪武朝时已成书。

② 佚名撰,王崇武校注《明本纪校注》,第36页。

③ 《明太祖实录》卷3,乙未岁四月条,第30页。

④ 佚名撰,王崇武校注《明本纪校注》,“序”,第6页。

⑤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101《太祖实录辨证一》,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101—2102页。

⑥ 黄伯生《故诚意伯刘公行状》,杨讷《刘基事迹考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197—206页。

⑦ 杨讷《刘基事迹考述》,第174—177页。

⑧ 刘辰《国初事迹》,邓士龙辑《国朝典故》,许大龄、王天有点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7页。

⑨ 商辂等《续资治通鉴纲目》卷26,元顺帝至正十一年五月条,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⑩ 商辂等《续资治通鉴纲目》卷27,元顺帝至正十五年二月条。

⑪ 商辂等《续资治通鉴纲目》卷27,元顺帝至正十五年条。

⑫ 商辂等《续资治通鉴纲目》卷首《凡例》。

⑬ 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凡例》,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482页。

此表示当时的执政者本身合法性不足。《续纲目》凡例云(括号内为原注):

凡中国为正统,夷狄不得纪元(辽、金、夏皆不纪,仿汉、唐例);及金、元得中原,然后分注纪年于宋年下(仿晋、魏例)。

凡夷狄干统,中国正统未绝,犹系之中国;及夷狄全有天下(谓元世祖),中国统绝,然后以统系之。其间书法间亦有异(如中国有称兵者不书反叛之类)。及中国有义兵起,即夷之于列国(如秦隋之末)。^①

《续纲目》对韩宋不称反叛而称“兵起”,即暗示元朝为“夷狄干统”的特殊“书法”。

《纲目》凡例,“建国”君主初立用“为”字,而“僭国”君主初立用“称”字。^②这样看来,《续纲目》将韩宋作为“僭国”来对待,次于“建国”,但并非最低待遇。对照《纲目》书写其他农民战争所建政权的方式,张楚建国作(陈)胜自立为楚王,^③为“仗义自王”的建国;^④隋末的窦建德夏政权、李密魏政权等为僭国;而唐末的黄巢大齐政权则仅称“黄巢僭号”,不称之为国。可见,纲目体史书如何书写农民政权,首先取决于作者对当时统治王朝的定性。《续纲目》对元末农民战争的书写,相当程度上参考了《纲目》对陈胜吴广起义的书写。宋人尹起莘《资治通鉴纲目发明》云:“胜、广崛起草莽,本不足以国书,而书之曰‘楚’,若大国然者,尊楚所以恶秦也。”^⑤明人周礼《续资治通鉴纲目发明》云:“韩林儿自立为宋帝,则《纲目》宋之;徐寿辉自立为天完主,则《纲目》天完之。其杀也,书弑;其贼也,书讨。盖所以成之为列国也。其成之何?恶元而已矣。”^⑥

《纲目》“尊楚”以“恶秦”,《续纲目》则视韩宋、天完为列国以“恶元”。《续纲目》编者对元朝的笔法是仿照《纲目》对秦、隋的笔法而来。《续纲目》全书中除宋、金、元三朝外,在岁首列出纪年的只有元末群雄诸政权,而宋代出现的诸多农民政权与伪楚、伪齐等傀儡政权都没有岁首纪年。《纲目》每年的干支下记载各政权的纪年,以字体大小的区别起到“因年以著统”、标明正统所在的作用。正统王朝每年大书纪年,非正统的大国每年分书纪年,非正统小国仅分书各元年。《续纲目》中韩宋等元末诸政权都是分书元年。《纲目》中正统王朝没有灭亡前就书写群雄政权年号的,只有隋朝。这种纪年方式也是对元朝地位的贬低。

《续纲目》在明代史学史上有相当的影响,^⑦此书虽仍未揭示韩宋与朱明政权的关系,但其对韩宋地位的初步提升、对龙凤年号的使用,都影响了明代中后期私修史学的基调。

三、明中后期私修史学对韩宋的书写

成化以降,明代社会中对韩宋名号的忌讳心理逐渐消退,龙凤年间形成的原始文献逐渐被发掘

① 商辂等《续资治通鉴纲目》卷首《凡例》。

② 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凡例》,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1册,第3481页。

③ 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凡例》,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1册,第3477页。

④ 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卷2,秦二世元年七月,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8册,第133页。

⑤ 商辂等撰,玄烨批《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2,秦二世元年七月,天津图书馆藏。

⑥ 商辂等撰,玄烨批《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卷27,至正十五年十二月,天津图书馆藏。

⑦ 参见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7—58页。

出来。成化年间叶盛编《皇明诏旨录》,也收入龙凤、吴元年所颁的诏令。^① 约弘治十二年(1499年)刊刻的陶安《陶学士文集》,其卷首《陶学士事迹》载有三篇注明龙凤四年(1358年)、龙凤十年(1364年)的文书。^② 程敏政编《唐氏三先生集》,作序云“龙凤丁酉秋,我高庙将兵下江南,驻新安,延访耆宿。”^③ 此集最早刊于正德十三年(1518年),集中收录了唐桂芳五篇提到龙凤年号的诗文。^④ 但忌讳仍有一定的影响。嘉靖台州知府王可大刊刻的方孝孺《逊志斋集》中收有《越国公新庙碑》,讲述胡大海早年经历时云“龙凤乙巳春二月,王师取和州。”^⑤ 正德刊本《宋学士文集》也有相同文字,但此处作“乙巳春二月,王师取和州。”^⑥ 嘉靖本《逊志斋集》编者认为此文是方孝孺“代太史公作”,未必准确,^⑦ 但龙凤年号的出现反映了社会思潮的动向。钱谦益谈及此碑文时称“家有旧版《逊志斋文集》,摩娑此一行,楮墨模糊,剝刷之痕迹宛然,二百年来改窜之遗迹,犹可想见。”^⑧ 可见,龙凤年号仍然引发了藏书者的自我禁抑行为。又如朱元璋以“皇帝(指宋帝韩林儿)圣旨,吴王令旨”名义发布的《平伪周榜》,王鏊等人编纂的正德《姑苏志》收录此榜时仅作“吴王令旨”,^⑨ 王世贞《诏令杂考》则作“高皇圣旨,吴王令旨”,^⑩ 以回避韩林儿。

龙凤文献的复出,促使明代史家注意到韩宋政权的存在,如何书写韩宋政权成为编纂明开国前史时必须面对的问题。明中后期众多通史、宋元史、元史及本朝史著作都涉及韩宋政权,翻检各书可发现时人具体的关注点、分歧点有三:史实方面,龙凤元年(1355年)朱元璋是否接受了韩宋的正朔与官职,以及韩林儿的结局如何;史法方面,是否以龙凤年号纪年;史论方面,韩林儿与朱元璋是否存在君臣关系。换言之,明代史家关心更多的是韩宋的历史地位及与前后王朝的关系,而非史事细节本身,被唤醒的韩宋具体历史记忆还是相当干瘪的。

明中后期文网虽然放宽,但仍发生了陈建《皇明通纪》、曹学佺《野史纪略》、杨惟休《泰昌日录》、许重熙《五陵注略》等编撰本朝史引发的若干文祸,令时人讨论本朝史事时仍有所顾忌。明人有关韩宋政权的论说以发表个人看法或评论少数前人观点为主,虽然众声喧哗,但少见深入剖析或往复辩难者。有些作者仅是表明态度而未提出史料佐证,难以就单一论者作深入的个案分析。^⑪ 以下从朱元璋是否接受正朔、官职的事实问题与纪年笔法问题两方面入手,分类归纳各种观点。

笔者翻检了《续资治通鉴纲目》成书后出现的24种编年、纪传及纪事本末体明代私修史著,将其对韩宋史事的书写情况列表对比如下:

-
- ① 叶盛《菴竹堂稿》卷5《皇明诏旨录引》,《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46册,黄山书社2013年版,第323页。
 ② 陶安《陶学士文集》卷首《陶学士先生事迹》,《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9册,黄山书社2013年版,第551页。
 ③ 程敏政《序》,唐元等《唐氏三先生集》卷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5册,黄山书社2013年版,第6页。
 ④ 唐元等《唐氏三先生集》卷15《代送王鹏举之茅山》《题徐县丞善政后》、卷17《排律十八韵奉呈允博士先生》、卷18《紫阳书院开讲序》、卷19《重修兴安府孔子庙记》,《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5册,第224、230、251、268、281页。
 ⑤ 方孝孺《逊志斋集》卷22《越国公新庙碑》,《四部丛刊》,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
 ⑥ 宋濂《宋学士文集》卷5《胡越公新庙碑》,《四部丛刊》,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
 ⑦ 按《越国公新庙碑》文意,此文当作于1364年冬胡大海获追赠浙东平章、越国公等官爵不久。方孝孺生于1357年,洪武十年(1377年)始投师宋濂,此文不大可能拖延至此时方作。且收录此文的《奎坡集》为宋濂亲自编定,收入学生代笔作品的可能性亦较低。参见王春南、赵映林《宋濂、方孝孺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9页;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2—3页。
 ⑧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102《太祖实录辨证二》,第2119页。
 ⑨ 正德《姑苏志》卷36《平乱》,《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13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第294页。
 ⑩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85《诏令杂考一》,魏连科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15页。
 ⑪ 明人对韩宋史事讨论较深入者仅有钱谦益,但其生年已入清,与其往复商榷者也主要为清人,在此不纳入表中。

表1 明中后期私修史著对韩宋史事的书写情况表^①

史家及主要史著	是否认为朱元璋奉龙凤正朔	是否认为朱元璋接受韩宋官职	是否使用龙凤纪年
吴朴《龙飞纪略》	是	否	在元朝年号后,与其他群雄年号相同
丘濬《世史正纲》	未涉及	未涉及	在元朝年号后,与其他群雄年号相同
陈建《皇明通纪》	是	默认	在元朝年号后
高岱《鸿猷录》	是	自相矛盾	否
陆深《平胡录》	是	未涉及	在元朝年号前
孙宜《大明初略》	是	是	否
薛应旂《宋元通鉴》	未涉及	未涉及	在元朝年号后,与其他群雄年号相同
王宗沐《续资治通鉴》	未涉及	未涉及	否
佚名《秘阁元龟政要》	未涉及	未涉及	在元朝年号后,与其他群雄年号相同
雷礼《皇明大政纪》	未涉及	未涉及	否
邓元锡《皇明书》	是	未涉及	否
李贽《续藏书》	是	是	未涉及 ^②
黄光升《昭代典则》	否	否	否
李纯卿《世史类编》	未涉及	未涉及	在元朝年号后,与其他群雄年号相同
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	未涉及	未涉及	否
涂山《明政统宗》	否	否 ^③	在元朝年号后
张铨《国史纪闻》	默认 ^④	未涉及	否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	是	是	在元朝年号前
何乔远《名山藏》	是	否	独用龙凤年号
尹守衡《明史窃》	是	否	否
徐昌治《昭代芳纂》	未涉及	未涉及	在元朝年号后
姚允明《史书》	是	否	否
朱国祯《皇明史概》	是	自相矛盾	在元朝年号后
刘振《识大录》	是	否	否

(一) 朱元璋奉正朔与受官职问题

明中后期涉及明开国史的著作,多已承认朱元璋曾奉龙凤正朔,仅有少数仍不承认。吴朴《龙飞纪略》成书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⑤,是明代第一部承认朱元璋用龙凤正朔的私修史书。陈建《皇明通纪》采录了《明太祖实录》“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之语,却未采用《明太祖实录》接下来“遂不受”三字^⑥,进行模糊处理。其后更叙述郭家军在太平时“文移用宋龙凤年号”^⑦,至1366年又

① 中晚明其他杂史、笔记、政书等史籍中涉及明开国史事者尚多,但这24种史著体例较为严整,便于比较其在同一个叙事或书法问题上的态度。郑晓《吾学编》、薛应旂《宪章录》等著作断限起于洪武元年,未直接叙述明开国史,不纳入本文讨论范围。陈建、沈国元《皇明从信录》的明开国史部分大体沿袭《皇明通纪》,故不单独列出。

② 李贽《续藏书》仅有列传,且无韩林儿等人传记,与韩宋关系见于郭子兴的传记。李贽《续藏书》卷1《开国诸臣缘起》,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页。

③ 《明政统宗》附卷记载朱元璋“亦奉其正朔、授官爵”,然此卷题下注明“俱系名公论议”,系杂抄各家文字而成。此语实出自王世贞《史乘考误》与涂山本人观点不同。参见涂山《明政统宗》附卷,《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3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28、176—177页;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21《史乘考误二》,第375页。

④ 张铨记述朱元璋“迎之(韩林儿)金陵,欲奉为主”默认朱元璋奉韩宋正朔。张铨《国史纪闻》卷1,田同旭等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36页。

⑤ 钱茂伟《明代史学编年考》,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92—95页。

⑥ 陈建《皇明通纪》卷1,钱茂伟点校,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8页。

⑦ 陈建《皇明通纪》卷1,第22页。

有“小明王既歿,上諭群臣定議,以明年為吳元年”,^①將奉龍鳳正朔之事完全公開。

史家對此解釋的思路各異。郎瑛認為朱元璋對韓林兒“必惑於當時訛傳之事矣”,^②意指朱元璋相信韓林兒為宋室後裔,真心尊崇。有些史家提出朱元璋奉龍鳳正朔只是出於具體需要,姚允明謂朱元璋只是“志在滅胡,又不欲速帝,則以宋紀者,正也。於小明王則何藉哉!”^③姚氏的觀點不盡屬實,朱元璋若只欲以大宋國號召人心,亦可自立宋國,不必用龍鳳正朔,而且很難認為朱元璋此時已確立了日後稱帝的想法。《明本紀》謂朱元璋取江南後“宵晝自思固保江東諸郡,以觀群雄,若仁者治世,當全江東,共樂承平”,^④應屬實情。並且朱元璋還曾與察罕帖木兒通好、結援,志在滅胡、不欲速帝這類說法只是以“後見之明”為朱元璋開釋。朱國禎《皇明史概·大政記》稱用龍鳳正朔是為了與韓宋“不顯絕也”。^⑤同書《大事記》又稱“皇祖自丙申而前,神龍雜於鱗甲,稍見頭角,僅僅躍淵。”^⑥說朱元璋為求自保而接受韓宋正朔,更為接近事實。

《明政統宗》《昭代典則》等少數史籍繼續完全否定奉正朔、受官職之事,但並未提供新論據,僅僅復述《明太祖實錄》中“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之語。與此相反,根據《明本紀》與《國初事迹》成書的孫宜《大明初略》,沿用《明本紀》中肯定受職的說法。^⑦執類似說法的還有李贄與錢謙益。

因《明太祖實錄》明言朱元璋未受韓宋官職,《龍飛紀略》《名山藏》等書均採取調和態度,認為朱元璋行用龍鳳年號,但未接受左副元帥官職。另有一些人採用更加曖昧的態度——吳朴稱朱元璋未接受左副元帥的官職、張天祐接受了右副元帥之職。^⑧高岱《鴻猷錄》各篇目之間敘事存在矛盾——《集師滁和》篇仍說朱元璋對韓宋官職“却不受”;^⑨《宋事始末》篇卻說“上初欲不受……後以諸將議欲藉為聲援,從之”,但稱朱元璋“事皆不稟其(韓宋)節制”,^⑩以維護朱元璋獨立自主的形象。《皇明史概》也有類似的情況——紀事本末體的《大事記·韓林兒》篇僅敘述韓宋授官之事,而編年體的《大政記》則記載“上不受”。^⑪這種同書自相矛盾的狀況或許是史家難以決斷的結果,或許是出於不同篇章分別襲用不同史源的粗暴做法,但無疑都體現出私修史學書寫此事時面臨的困境。

此外,《宋元通鑑》等八部史籍完全不提這兩個棘手的问题。講史小說《英烈傳》將朱元璋與韓宋脫清干系,稱朱元璋之舅郭光卿(以郭子興為原型)起兵歸附韓宋,朱元璋前來投奔後勸其“去紅巾、自立王號”,并向劉福通許諾“他日宋主有危,吾願解圍,以報起兵之恩。”^⑫《英烈傳》很可能是勛臣郭勛編纂,又經內府宦官表演、南京齊府宗室刊刻,具有強烈的稱頌明朝開國君臣的色彩。^⑬小說作者將歸附韓宋之事推給本不相干的郭子興,也說明了明人面對這一問題時的尷尬。

持朱元璋未奉龍鳳正朔觀點者,或持僅用正朔、未接受韓宋官職觀點者,都未提出新證據。這一

① 陳建《皇明通紀》卷3,第92頁。

② 郎瑛《七修類稿》卷9《國事類》,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92頁。

③ 姚允明《史書》卷10,《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50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46頁。

④ 佚名撰,王崇武校注《明本紀校注》,第55頁。

⑤ 朱國禎《皇明史概·大政記》卷1,《續修四庫全書》第42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18頁。

⑥ 朱國禎《皇明史概·大事記》卷2《韓林兒》,《續修四庫全書》第430冊,第56頁。

⑦ 孫宜《洞庭集》,《中國野史集成》第22冊,巴蜀書社1993年版,第482—491頁。

⑧ 吳朴《龍飛紀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9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432頁。

⑨ 高岱《鴻猷錄》卷1《集師滁和》,孫正容、單錦珩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頁。

⑩ 高岱《鴻猷錄》卷2《宋事始末》,第28—29頁。

⑪ 朱國禎《皇明史概·大事記》卷2《韓林兒》,第56頁;朱國禎《皇明史概·大政記》卷1,第518頁。

⑫ 劉兆軒《明版〈英烈傳〉校箋》,碩士學位論文,廣西師範學院,2014年,第58頁。

⑬ 溫慶新《〈英烈傳〉的編纂、流布及意義新論》,《學術交流》2019年第10期。

矛盾逐渐被史家以考据方法解决。王世贞首先根据《朱氏世德碑》中朱元璋三代获封的官职称“岂诸将臣上之而以宋龙凤之制行之耶?抑龙凤主来见册也?”^①质疑《明太祖实录》将朱元璋的官职归于诸将共奉的笔法。钱谦益以俞本《纪事录》、叶子奇上孙炎书等史料为根据,考察了朱元璋任枢密院同佥、江南行省平章、丞相、吴国公等一系列官爵的经历。^②至此,朱元璋接受韩宋官职的事实完全清楚了。面对事实,出现了认为朱元璋受韩宋官职合情合理,不必忌讳的观点。茅元仪云“英雄之起,随时屈伸,后世史笔何必曲为之辞,以失英雄本色乎!汉高之兴,沛公之命、汉王之号,皆受之于人,亦何碍乎!”并指责高岱的朱元璋不受官职、只用龙凤正朔的叙事“于事理不通,直是其识卑耳”。^③但此事毕竟牵涉禁忌,不可简单斥责高岱等人见识卑下。

(二) 龙凤纪年的运用

《续纲目》带动了用龙凤年号纪年的风气。《龙飞纪略》《世史正纲》《宋元通鉴》《秘阁元龟政要》《世史类编》等书沿袭了《续纲目》的笔法,以元朝年号在前、群雄年号在后。陈建《皇明通纪》更进一步,将龙凤元年(1355年)至龙凤十二年(1366年)全部标注在元朝年号之下。《续纲目》将韩宋与天完等其他元末群雄政权的纪年都作为贬低元朝的工具,而《皇明通纪》仅使用龙凤年号,赋予韩宋特殊地位。朱国祯《皇明史概》、徐昌治《昭代芳摹》和佛教史书释大闻《释鉴稽古略续集》纪年方式也类似。值得注意的是,涂山《明政统宗》虽不承认朱元璋奉龙凤正朔,却也加入了龙凤纪年,足见这一纪年方式的流程度。

陆深、钱谦益等人更是将龙凤正朔置于元朝纪元之前。陆深《平胡录》分别以元、韩宋、天完与陈汉为主体分四篇叙述,纪年方式各有不同。元篇以元朝年号纪年,韩宋篇中龙凤年号在前、元朝年号在后,天完篇纪年以元朝、天完与韩宋的顺序排列,陈汉篇顺序则为元朝、韩宋与陈汉。^④天完与陈汉篇都出现韩宋年号,反之则否,体现出韩宋地位高于其他元末群雄政权。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正式称韩林儿为“王”,大写龙凤纪年,而分书元朝纪年。^⑤天完、陈汉、明夏、张士诚等篇目则大写元朝纪年、分书该政权年号。最为特殊的是何乔远《名山藏》,仅以龙凤正朔书写明朝开国史。按照钱谦益、何乔远的“书法”,韩宋政权俨然取代元朝,成为元明之际的正统所在。

也有史著采用独尊本朝的纪年方式。黄光升《昭代典则》在朱元璋建元前只用干支纪年;^⑥李纯卿、李槃《世史类编》独出心裁,于朱元璋起兵后,在干支下先分书元朝及群雄纪年,再大书“大明太祖若干岁”,^⑦以示天命已经转移到朱元璋身上。可见,贬低元朝地位是明中后期史家中的普遍现象,只是手段不一,未必以提升韩宋等群雄政权地位的方式完成。

四、明人对韩宋的再评价

明代前期官方攻击韩宋为“妖人”“贼”,私修史书亦无异词。明中后期皇权松弛、文网渐宽,官

①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6《异典述一》,第102页。

②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101《太祖实录辨证一》,第2101—2102、2108页。

③ 茅元仪《掌记》卷4,《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10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383页。

④ 陆深《平胡录》,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⑤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1《宋小明王》,《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8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

⑥ 黄光升《昭代典则》卷1,《续修四库全书》第35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⑦ 李纯卿等《新刻世史类编》卷45,《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55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327页。

方史学未再措意于开国史事,给了私修史学重新审视韩宋政权地位的空间。论者多承认韩宋政权对朱元璋的帮助作用。陆深云“天命真人,神武不杀,克成混一之功,亦微有资于龙凤云。”^①高岱云:“刘福通者,盖将为我圣祖先驱定中原者乎?不然,察罕之兵且萃于江南矣。”^②张溥云“刘福通、徐寿辉,固亡胡之首功也。”^③黄景昉云“极元君臣将相谋略,以枝拄中原不给,无暇及江南一步。其后徐、常北伐之师摧同枯朽,亦未必非群盗力。”^④

不仅如此,还出现了认为韩宋于中国有大功、甚至本可夺取天下的观点。李文凤认为韩宋对整个“中国”都有贡献,他借用宋人以陈胜、吴广为“秦民之汤、武”的说法,^⑤认为韩宋君臣“不谓之中国之汤、武不可也”,认可其解放民众的功绩;李文凤又云“韩氏君臣非特有功于中国,其亦大有功于我明也乎!”^⑥尹守衡认为“使(韩宋)据大梁,行吊伐,蘊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前人故事,夫岂难图?”但韩宋因不施仁义、专恃暴力而失败。^⑦史家使用汤武、吊伐等天命史观中的常见话语,提示元朝因暴政而失去天命;而韩宋对“中国”有功,显然是从华夷之辨角度谈的。明人从天命史观与华夷之辨的角度论证了韩宋政权起义的正当性,却无意中削弱了本朝对正统的独占地位。朱元璋强调“首乱”必不能成功,尹守衡则认为韩宋是因具体的不行仁义之举而失败,虽仍将行仁义之名归于朱元璋,但至少承认韩宋获得天命的历史可能性。

韩宋政权应该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什么样的地位?其反抗元朝的正当性已被确定,剩下的问题则是如何定位其与赵宋和明朝的关系。韩宋自称赵宋后裔的宣传在明前期已被否定,但明中后期的士人往往又将韩宋政权与赵宋王朝联系起来,这一方面与明人重视宋朝史事有关,^⑧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对韩宋的部分肯定。陆深认为韩宋虽是“妖民托宋之余”,亦“可以观人心之向往矣”。^⑨尹守衡甚至称朱元璋“念小明王为后于宋以伐元,奉宋约,不肯以寸铁遗安丰忧”,^⑩近乎借朱元璋的身份表达自己认可小明王的观点。黄瑜称道韩宋政权为“宋复元仇”,认为此事与陈涉建立张楚、楚义帝等伐秦、刘渊灭晋、刘裕篡晋、后唐灭梁及南唐继承唐祚等现象类似。^⑪张溥也提出类似说法,称“汉之后,非汉而称汉以残晋者,曰刘渊;唐之后,非唐而称唐以灭梁者,曰李存勖;宋之后,非宋而称宋以乱元者,曰韩林儿。”^⑫虽然前汉、后唐诸政权本身在明人看来也不具备正统性,^⑬但能与这些政权并称,至少说明时人认可韩宋应占一定的历史地位,而非纯粹的“贼寇”。

① 谈迁《国榷》卷1,张宗祥校点,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67—268页。

② 高岱《鸿猷录》卷2《宋事始末》,第34页。

③ 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26《东南丧乱》,《续修四库全书》第38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页。

④ 黄景昉《国史唯疑》卷1,陈士楷、熊德基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⑤ 苏洵云“陈胜、吴广,秦民之汤武也,无腹心之臣以不克。”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卷4《远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

⑥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1《宋小明王》,第40—41页。

⑦ 尹守衡《皇明史窃》卷30《小明王韩林儿》,《续修四库全书》第3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页。

⑧ 明人出于现实关怀对宋史的兴趣,参见吴漫《明代宋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27页;朱鸿林《15世纪之学术趋势》,朱鸿林《儒者思想与出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54—79页。

⑨ 谈迁《国榷》卷1,第267页。

⑩ 尹守衡《皇明史窃》卷30《小明王韩林儿》,第101页。

⑪ 黄瑜《双槐岁钞》卷1,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4—15页。

⑫ 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23《小明王之立》,第193页。

⑬ 刘渊所建前汉向来被视为偏霸政权,《通鉴》虽以后唐纪年,但自《纲目》起,便不予其正统地位。明代编年体通史如丘濬《世史正纲》、严衍《资治通鉴补》等同之。参见丘濬《世史正纲》卷2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6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476页;严衍《资治通鉴补》卷273,《续修四库全书》第43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33页。

至于韩宋与明朝的关系,朱元璋曾奉龙凤正朔一事若大白于天下,必然有损于明朝官方的正统性论证。明中后期的士人主要以两种口径处理这一问题,其一是称颂朱元璋对韩林儿的忠诚。吴朴称:

我太祖为吴王时,凡用人行政,见于牒文,则称曰“皇帝圣旨、吴王令旨”,上下施行,率以为常。迟迟三年,不建年号,及其既殂,乃称吴元年。孔子不云乎?“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势殊同归,臣谓太祖亦然,是故表而出之。^①

高岱称赞朱元璋:

以和阳一命,奉之终身。至安丰之围,尺书告急,即亲将赴援,不从刘基之谏,不惜陈寇之侵,卒以脱林儿于虎口。林儿不死不改元,下令犹以皇帝圣旨先之,恐汉高之于义帝、光武之于更始未必能若是也。^②

黄景昉也说“国初犹奉其龙凤纪年,至林儿殂始罢,德深厚矣。”^③朱国祯《皇明史概·大政记》于丙午年(1366年)纪年下分书“宋亡已二年矣”,^④暗示韩林儿虽在,韩宋已亡,朱元璋改立正朔并非不忠。当时甚至出现了朱元璋“挟林儿还金陵,曰‘此楚义帝也!’欲崇奉之”,经刘基劝说才取消的传说。^⑤这一传说脱胎于前述刘基不拜韩林儿画像的轶事,但其含义已从称赞刘基的远见变成了褒扬朱元璋对韩宋的忠心。如此一来,朱元璋在韩林儿生前仁至义尽,在其死后另立明朝便没有道德问题了。

其二是提出韩林儿只是傀儡,不足以称君主。吴朴一面称“宋是国家首事之主”,^⑥一面又说:“臣尝以为比之(指韩林儿)前古,以楚义帝则不及,方汉更始、刘盆子颇相类,皆为人所以,君臣之分未立,盖已不能君人,人亦不以为君者也。”^⑦陈建大体袭用了吴朴的后一段评论。^⑧黄景昉称“韩林儿称宋遗号,自初造至败,无足道者。”^⑨攻击韩林儿不配作朱元璋的君主,比否定韩宋政权更容易立论。按照这一思路,朱元璋不必为背弃韩宋负责。

这两种口径确实有事实为基础,具备一定说服力,然而明初朝廷对龙凤正朔的忌讳,以及朱元璋杀害韩林儿的可能性,削弱了这些说法的可信性。朱元璋本人都不能直面自己臣服韩宋之事,又如何令后人相信其忠心呢?面对这一困境,钱谦益一面以考据方法力证朱元璋对韩宋奉正朔、受官爵,一面又宣称朱元璋未曾忌讳此事“龙凤之于我明也,高皇帝未尝讳也,而载笔之臣讳之。”^⑩“今之史

① 吴朴《龙飞纪略》,第499页。

② 高岱《鸿猷录》卷2《宋事始末》,第34页。

③ 黄景昉《国史唯疑》卷1,第3页。

④ 朱国祯《皇明史概·大政记》卷1,第526页。

⑤ 朱国祯《皇明史概·大事记》卷2《韩林儿》,第57页。

⑥ 吴朴《龙飞纪略》,第413页。

⑦ 吴朴《龙飞纪略》,第498—499页。

⑧ 陈建《皇明通纪》卷3,第92页。

⑨ 黄景昉《国史唯疑》卷1,第3页。

⑩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90《天启元年浙江乡试程录》,第1873页。

家,刊落龙凤之事,使元、宋之际不得比于《秦楚之际月表》,此后世媚臣腐儒之所为,而岂圣祖之志也哉!”^①将消除韩宋历史记忆的责任归于“后世媚臣腐儒”,维护朱元璋的坦荡形象。所谓“高皇帝未尝讳也”当然并非事实。出于同样的逻辑,钱谦益以考证提出韩林儿之死系被杀,却坚决将罪过归于明将廖永忠的“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虑”。^②钱谦益的辩护,既可调和朱元璋与韩林儿之间的君臣伦理矛盾,又可将自身考证这段敏感历史的行为正当化。

与其他史家不承认韩、朱君臣关系之说相反,钱谦益将元末、韩宋的历史与《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相比拟,提出“元、宋之际”的概念,认为韩林儿类似楚义帝,是元末义军共主,树立“元—韩宋—明”这一另类正统观,暗示朱元璋奉韩宋正朔如同刘邦尊奉义帝一样合理。此说在清初较为流行,顾景星认为韩林儿“非盗贼”即其表现之一。清初官员王源称,参与修《明史》的万斯同曾“欲奉一未成事之贼子牧豎为正统,与太祖正君臣之分”。^③易代后政治压力减轻,使得认可韩宋历史地位的思想进一步抬头。

余 论

在“元明革命”性质的讨论中,前辈学者多偏重研究明廷及当时士人的态度,甚至将民族革命色彩视为“后人涂抹上去的”。但“元明革命”这个概念本身就有使观察视野局限于朱元璋政权的危险,不足以涵盖14世纪五六十年代激烈历史运动的全貌,元末农民战争带有的民族斗争色彩是不容忽视的,韩宋、徐宋、明夏、陈汉等政权都提出过类似“驱胡”的口号。明初朝廷斥责韩宋领袖为“妖人”,刻意压制相关历史记忆,清廷又通过隐没史实、篡改文献的方法,有意削弱这段历史的夷夏色彩。^④明中叶以后明蒙关系的再度紧张,促使官私史学利用书写韩宋的笔法削弱蒙元的正统地位,韩宋被视为“列国”乃至“正统”,甚至被称为“中国之汤、武”“国家首事之主”。这一此前少有人注意的现象,体现了中国古代史学正统观念的复杂性。当华夷之辨成为思想领域的首要议题时,“官”与“寇”的界限变得不再清晰,甚至一代而亡的失败者也有了染指正统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中晚明韩宋历史书写的主要依据限于元明之际留下的少量文字材料,官私史学都未广泛搜集口头传承及地方、民间文献。明代以来北方民间流传着一些有关韩宋红巾军变形的集体记忆,如河北、河南、山东流传着明初闹“红虫”把人吃光,引发了洪洞大槐树迁民的故事;^⑤河南偃师市缙氏镇崔河的《崔氏家谱》提到洪武年间河南“遭受红雨,人畜伤亡,人烟稀少”。^⑥红虫、红雨之灾很可能是对元末红巾军活动及战争中人口严重损失的扭曲记忆。^⑦但明代士人并未重视这些民间记忆,将其加入私修史著,明廷也因历史问题,选择压制、淡化韩宋记忆,否则北方红巾军“焚荡城郭,杀戮士夫”之类的详细记载反而会招来士人的厌恶。^⑧在性质相近的清初四川人口锐减问题上,清

①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103《太祖实录辨证三》,第2124页。

②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103《太祖实录辨证三》,第2124页。

③ 王源《居业堂文集》卷6《与友人论韩林儿书》,《续修四库全书》第14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页。刘承干认为此信是写给万斯同的,参见刘承干编《明史例案》卷8《王昆绳与友人论韩林儿书》。

④ 张佳《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改革研究》,第307—323页。

⑤ 张青、林中园编著《洪洞古大槐树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4—135页。

⑥ 赵世瑜《说不尽的大槐树: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5页。

⑦ 赵世瑜《说不尽的大槐树: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第55—60页。

⑧ 语出朱元璋《平伪周榜》,参见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85《诏令杂考一》,第1615页。

代官方以宣扬“为明复仇”来建构自身统治的合法性^①，造成清代多数官私史书均大肆渲染“张献忠屠川”事件。^②由此看来，农民军建立的政权在旧史学中并非完全不被接受，但对其评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反对的政权的地位，以及当时的具体政治局势影响。

李卓颖认为，明代中期苏州士人将口语中的张士诚记忆写成文字，藉以表达与官方叙事范式针锋相对的态度，质疑其中朱元璋的“王者风范”，并对明初的状况提出批评。^③韩宋记忆的复归与此不同，传播者并无暗讽本朝之意，但韩林儿与朱元璋同样出身汉人平民，明朝对自身统治正当性的论证多可换用于韩宋，故称扬韩宋者必须设法弥补这一问题，避免危及本朝正统。最终出现了士人严肃地讨论曾被定为“妖人”“贼首”之人是否与本朝皇帝存在君臣关系的现象。这是明中后期皇权松弛的结果，也是思想风气活跃的表现之一，但这些讨论的目的并非贬低本朝，而是更好地维护已神圣化的明太祖形象。在官方始终未发声的情况下，一些士人自发修改官定的明太祖白手起家故事，为其增加了一个名义上对君主尽心尽力的“忠臣”光环。宋以后史学的义理化趋势，与明代士人对开国皇帝的爱护结合起来，造成了这样诡异的现象。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农民战争史研究逐渐由显学步入沉寂，其背后有着复杂多样的原因，如研究视野狭窄、方法单一等。如赵现海所说，在世界历史上中国的农民战争最为频繁、规模最大、影响最巨，农民战争带来的周期性王朝更迭是中国文明的一大特色，故而农民战争可作为揭示中国历史核心问题与主要线索、整体审视中国历史、揭示中国文明独特历史道路的视角之一。^④但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也亟须更新。近年来，史料批判的研究（又称“历史书写”的研究）在中国古代史领域逐渐兴起，这种研究范式通过比勘文献异同、分析文献成书背景和比较同类文献的性质、结构，追问史料的性质及形成过程、史家的书写目的，由此观察影响历史书写的政治环境、社会氛围和文化思潮等。^⑤同样，历史书写范式也可用于研究农民战争。农民战争发源于社会底层，古代历史书写的权力则被政治、文化精英所垄断，通过历史书写研究可打通二者之间的关系，并审视农民战争在中国文化中的整体意义与深层次影响。孟祥才提出，可将视角转到思想文化方面来对农民战争进行新的观照。^⑥赵现海认为，为什么清初史籍会对张献忠屠蜀有如此繁多、详细、生动的记载，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⑦这与历史书写范式的思路是不谋而合的。旧史学中本身含有古人对农民战争的多重看法，应予以全面的考察；建立在其上的现代农民战争史丰富成果，也应在继承的同时辨别其中夹杂的刻板印象。

（作者周中梁，长江大学人文与新媒体学院讲师；邮政编码：434000）

（责任编辑：张舰戈）

（责任校对：苑 苑）

① 参见张献忠《“张献忠屠蜀”与清朝政治合法性之建构》，《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5期。

② 参见何锐等校点《张献忠剿四川实录》，巴蜀书社2002年版；胡昭曦《“张献忠与四川”史籍鉴析》，《地域文化研究》2018年第1期。

③ 李卓颖《易代历史书写与明中叶苏州张士诚记忆之复归》，《明代研究》第33期，2019年12月。

④ 赵现海《“新农民战争史”的提出——明末张献忠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可能》，《中国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2期。

⑤ 有关中日学者在魏晋南北朝史领域进行的史料批判研究，参见孙正军《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研究》，《文史哲》2016年第1期。

⑥ 孟祥才《历史动力惟一论统摄下的农战史研究》，《史学月刊》2005年第7期。

⑦ 赵现海《新农战史研究大有可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0月27日。

On the Climate of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Yuanyou Period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Yan Yongcheng*

The unique climate of historical studies is often reflec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ertain political , intellectual and even social and cultural conditions of a specific era. It is also shaped by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real politics , intellectual ideas , and scholarly interests of the time. During the period of Yuanyou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 the unique political situation had a direct impact o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by official and private historians alike. Not only did they inherit the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from the Ren-Zong period , but also they promoted the pursuit of individual scholarly interest. Furthermore , numerous bureaucratic literati chronicled historical records for pragmatic purposes , as a way to consolidate their social network. It strengthened the functionality of historical studies in politics and society. Hence , the climate of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Yuanyou period was no doubt a consequence of blended development of politics , academia , and scholarly interests , leaving a lasting impact on later generations.

Historical Writings on the Han-Song Regime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 *Zhou Zhongliang*

The early Ming government concealed Zhu Yuanzhang 's claim of vassalage to the Han-Song regime and attempted to suppress the social memory of this event. They also depreciated the status of the Han-Song in official historical records. The official record in *Xu Zizhi Tongjian Gangmu* during the Chenghua period treated the Han-Song regime with higher status for the purpose to downgrade the orthodox status of the Yuan dynasty. By the mid-and-late Ming period , private historiography began to focus on the Han-Song regime due to the resurgence of Longfeng documents. Historians differed in their views on whether Zhu Yuanzhang once adopted the Longfeng era name and received official titles designated by the Han-Song regime. Most mid-and-late Ming historians acknowledged the Han-Song 's achievements against the Yuan court but defended Zhu Yuanzhang 's reputation by praising his loyalty and denying Han Lin 'er 's status as a monarch.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the Han-Song regime was influenced by factors such as official manipulation of memory , loosening of imperial control , and tensions in Mongolian-Han Chinese relations , which reflected the complexity of ancient Chinese orthodox views.

A Refutation of the “Xia Dynasty Skepticism” since the Twentieth Century // *Wang Qi*

There has not been a consensus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on whether the Xia was a historic dynasty. Scholars cannot even agree on whether it ever existe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the “Xia Dynasty Skepticism” has undergone a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questioning the credibility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on the dynasty to doubting its very existence. Gu Jiegang was a key figure. Chen Mengjia and Yang Kuan invented the “Xia Dynasty Denial Theory” , and Sarah Allan further developed it into the “The Myth of the Xia Dynasty” . But these views are either lack of solid historical support or logical contradictions. They cannot prove that the Xia dynasty did not exist. Moreover , newly emerg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once again confirm the existence of the Xia proving that it was not a dynasty forged by the Zhou people.

Rethinking the Critical Developments in Studies of the Commemorativ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Li Junquan*

As a subject of scholarly inquiry , studies of the commemorative history of the CPC have achieved rapid development. However , scholars still face challenges due to limitations of some theoretical presuppositions. Some of them seem to overstress the political nature for commemoration days for the Party , underestimating the significant role of sociality for the people. Therefore , it will be an effective way to bring back the social time to studies of this topic. In other words , to overcome this challenge , scholars need to analyze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nd the dynamic transformation of commemoration days from political time to public social time in their studies. They need to explore the political rationale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Party 's social construction centered on the celebration of commemorative days. The greatest advantage of this approach is that it presents the ideological cognitions , political attitudes , public emotions and actions of the public in commemorative politics. It restores the historical pattern of mutual support and struggle among the Party , the government , the people , and various social forces on commemorative days.